

主编 李江



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百人工程』学者文库

跨 越 文 化 之 墙

——当代世界文化与比较文学

■ 何云波 等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百人工程”学者文库

跨越文化之墙

——当代世界文化
与比较文学

何云波 等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跨越文化之墙：当代世界文化与比较文学/何云波等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2

ISBN 7 - 5438 - 3567 - 3

I . 跨... II . 何... III . ①文化—研究—世界②比较文学—研究 IV . ①G11②I0 - 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1633 号

责任编辑：黎晓慧

装帧设计：胡薇薇

跨越文化之墙 ——当代世界文化与比较文学

何云波 等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邮编：410005)

长沙湘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4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11
字数：260,000

ISBN 7 - 5438 - 3567 - 3
I · 367 定价：22.00 元

《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百人工程”学者文库》

编 委 会

主任、主编：李 江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来文 王耀中 贝兴亚

朱有志 刘鸣泰 刘沛林

肖君华 易炼红 屈贵全

柳思维 唐凯麟 曹监湘

黄菊芳 彭国甫 熊治祁



作者简介

何云波，男，生于1963年，原籍湖南省新田县。1988年毕业于湘潭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200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获博士学位。1996年7月破格晋升教授。现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带头人，硕士生导师，湘潭大学特聘教授，四川大学兼职教授，湖南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2000年被遴选为铁道部青年科技拔尖人才，2002年获湖南省首届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称号，并被确定为“新世纪湖南省首批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才百人工程”培养对象。

主要研究俄苏文学和比较文学。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参加2项，主持省部级及校级项目4项，主持部级教研项目2项。获教育部和湖南省科技成果奖6项。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肖洛霍夫》（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围棋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中国文化新论丛书”，2001年）、《回眸苏联文学》（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对话：文化视野中的文学》（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年）、《围棋与中国文艺精神》（博士论文课题，待出版）。译有俄语小说《他人的书信》、《在人间》。主编《中西文化导论》。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国外文学》、《俄罗斯文艺》等刊发表论文90余篇。

总序

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 李江

21世纪驶入了科技发展的快车道。知识与科技的创新成为推动这个时代发展的引擎。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则成为推动这列快车前进的动力。

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国家的兴盛、民族的强大、社会的发展,无不通过科技和人才的兴旺发达折射出来。要在21世纪的科技、经济、文化的舞台上扮演主角,没有突出人才领舞是决不能实现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揭示了一条真理:谁拥有人才,谁就拥有未来;谁拥有创造性青年人才,谁就能创造未来。

湖南社科事业要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要跻身全国社科工作的先进行列,要开创湖南社科事业的新局面,实现湖南社科事业的大兴旺、大发展、大跨越,关键在于积聚一群在国内外有较高学术声望的专家学者,特别是拥有一批根底深、后劲足、潜力大的青年社科学术理论专家。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对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来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社会科学事业来说,也面临着一个黄金般的发展契机。一是党

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毛泽东同志指出，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有计划地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评论家，把理论工作搞起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江泽民同志指出，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和繁荣程度，是一个民族的综合素质和文化力量的重要体现和标志。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全党和全社会的重要任务。”这些重要论述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二是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以锐意创新的勇气和科学求实的精神，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的双重探索，推进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践源泉；加入世贸组织，我国对外开放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快速推进，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打开了一个面向世界、兼收并蓄、参与国际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格局。当今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越来越需要社会科学的理论阐释和科学解答。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珍惜历史机遇，不负时代重托，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用优秀的社科成果，服务科学决策，展示人文精神，推进文明进程。三是实施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建设工程，需要

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贡献聪明才智。李长春同志在 200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就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施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建设工程。当前,我们正处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摆在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历史性任务,就是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到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方方面面,形成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新理论成果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新闻学、史学、文学等学科,从各个方面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体系。实施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建设工程必须立足当今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联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不断地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要结合实施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建设工程,加快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

人才是第一资源。作为以开展社科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为主攻方向的社科事业,更是需要大批优秀人才来支撑和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我省加大了对社科人才特别是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才的培育力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要点》明确提出:“‘十五’期间,要把形成一批学贯中西、具有国内国际影响的学者,形成一批根底深厚、勇于创新的学科带头人,形成一批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作为我省社科事业兴旺发达的大事来落实。”2002 年实施了“新世纪湖南省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才百人工程”,从 304 位“双高”(高级职称、博士学历)青年社科研究者中选取 66 位 39 岁以下的有博士学位正高级职称的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为培育对象。2003 年颁布了《新世纪湖南省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才“百人工程”培育办法》。这无疑是促进“理论湘军”发展壮大的新方式,是储备人才、提升人才素质、振兴湖南社科事业的新手段,能收到“长江后

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的骄人效果。青年社科人才的成长,依赖于自身的努力,也依靠于各有关管理单位有计划的培育。胡锦涛同志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意义,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建设,关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各级主管部门、主管领导及社科研究部门要与时俱进,把人才的培育作为社科事业发展第一要务,要加强领导,加大投入,努力改进青年人才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营造有利于青年人才成长的环境。

自新世纪湖南省青年社会科学人才“百人工程”实施以来,省委宣传部划拨了专项培育资金,省社科规划办设立了“百人工程”专项课题,接着在《求索》杂志开设了“百人工程”学者介绍专栏。目前推出的“湖南社科研究‘百人工程’学者文库”既是培育“百人工程”学者的一种方式,也是首批“百人工程”学者最新理论成果的展示。全省各级社科规划管理部门要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加大投入的力度,加大培育的力度,加大宣传的力度,使我省青年社会科学优秀人才“百人工程”专家早日成长壮大。“百人工程”学者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多思慎思,多出精品、出上品,使自己成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精品力作的创作者和“四有公民”的培育者。

是为序。

目 录

第一章 全球化与 20 世纪中国文论话语转型	(1)
第一节 全球化与西方话语	(1)
第二节 20 世纪中国文论话语转型	(12)
第二章 比较文学与文化对话	(29)
第一节 欧洲中心主义与文化多元	(29)
第二节 跨文化对话	(38)
第三节 《刮痧》：文化冲突与对话	(51)
第三章 跨文化视野中的跨学科对话	(57)
第一节 跨学科与跨文化	(57)
第二节 同源共生与学科分化	(62)
第三节 跨学科对话	(71)
第四章 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	(80)
第一节 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身份	(81)
第二节 《所罗门之歌》与民族文化认同	(93)
第五章 网络时代的翻译文学	(110)
第一节 网络翻译文学的界定	(110)
第二节 网络翻译对文学翻译批评理念的挑战	(119)
第三节 文学翻译的网络化与翻译软件	(123)
第四节 网络翻译文学的意义与前景	(127)
第六章 阐释学与比较文学	(133)
第一节 西方阐释学	(134)

第二节 阐释学在中国	(141)
第三节 阐释学对比较文学的启示	(149)
第七章 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	(159)
第一节 西方的接受理论	(159)
第二节 接受理论在中国	(173)
第三节 接受理论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刷新	(185)
第八章 形象学与比较文学	(195)
第一节 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	(195)
第二节 形象学研究在中国	(208)
第三节 全球化语境中的形象学研究	(216)
第九章 女性主义与比较文学	(223)
第一节 西方女性主义	(223)
第二节 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接受	(227)
第三节 比较文学视域中的女性主义	(245)
第十章 后殖民主义与比较文学	(253)
第一节 何谓后殖民主义	(253)
第二节 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接受	(263)
第三节 冲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	(274)
第四节 个案分析:《黑暗的心脏》、《青山青》 ...	(286)
附录:	
(01) “全球化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笔谈	(301)
后记	(337)

第一章 全球化与 20 世纪 中国文论话语转型

全球化乃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而就全球化本身而言,它并不是当代才发生的事件,而是自西方文艺复兴就开始了。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事实上就是世界化。而如果把这种世界化的进程定位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那么它也就与“西方化”结下不解之缘。19、20 世纪之交开始的中国文论话语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就与这种“世界化”、“西方化”的大潮有关。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清理一下中国文论话语转型的过程,其中的得与失,对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也就不乏启示意义。

第一节 全球化与西方话语

一、全球化的进程

纪坡民在《从世界历史看全球化》一文中谈到,当今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通史》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分期简单地以一千五百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一千五百年之前的人类社会历史,只是“区域历史”,而不是“世界历史”,各文明区域虽然也有交流,但基本上是在相对隔绝的状态下各自独立发展,而“一千五百年以后”,准确地说,是 1492 年,以哥伦布远航大西洋发现“新大陆”为标志,从此,整个世界开始了联

为一体的进程，原来基本上各自独立发展的各个文明区域，通过商业、宗教、探险、战争、征服等媒介，发生联系、交流、接触、碰撞、冲突、影响和融合。“全球化”的进程，也就由涓涓细流，逐渐涌成不可逆转与势不可挡的历史大潮。从这时起，人类社会历史才进入“世界历史”的阶段，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全球化”。全球化的进程，在19世纪末达到高峰。西方有的学者认为，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发展程度，远未达到1890~1914年的水平。从人员、资金、物质、信息的自由流动尤其在世界各地区产生的“相互依赖性”的程度来看，确实如此。那时候，比如一个英国人，他能够在加尔各答、上海、开罗、悉尼、开普敦、渥太华……当然也有纽约、巴黎、柏林、东京、彼得格勒等世界各地自由往来，可以经商、传教、旅行，在他们的殖民地，还可以就业、做官、从军、居住，以至买房置地、立业成家、生儿育女。当时不用护照、签证，不要健康、防疫证明，没有邀请信、经济担保书以及几十种表格，国境只是象征性的边界线。就此而言，如今的全球化水平，的确没有达到那个程度。^①

但实际上，这种“全球化”，又是以欧洲实现对全世界的统治为实质内容的。哥伦布“发现”那块“新大陆”，被认为对“世界”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而这个“世界”，又是西方意义上的。“发现”、“命名”，体现的都是西方的主体性意识，而那块本来就存在的土地及其居民，只有被“发现”、“命名”之后，似乎才具有“存在”的意义。就像《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与“星期五”，一个“野人”，被命名为具有宗教受难色彩的“星期五”，并从此开始接受文明社会的教化，最后成为一个文明的“人”。这种“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文明”对“野蛮”的教化，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西方与东方的象征。

^① 纪坡民：《从世界历史看全球化》，《读书》2003年第1期。

由此,全球化、世界化的过程,事实上伴随的是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扩张,欧洲中心主义也就应运而生。全球化的进程,被认为在 19 世纪末达到高峰,其实正是欧洲殖民主义的高峰。到 20 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开始寻求自身的民族发展之路。但他们选择的社会发展模式,多为“现代化模式”,这种模式的范本,恰恰是西方社会所提供的。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社会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历程。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人权、理性、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成了“现代化”的一套思想、价值体系,经济的工业化,社会的城市化,成为“现代化”的普遍模式。当第三世界国家纷纷遵循这一模式,这种现代化,又与“西化”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就文学艺术而言,如果说各民族文艺都经历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而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化,使各区域文明被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艺术的“区域性话语”日益被“世界性话语”所取代。而这种“世界性话语”又往往是西方意义上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20 世纪的“世界化”事实上就是“西化”,20 世纪的世界性要求就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要求。正是这种要求注定了 20 世纪处于同一世界中的东西方艺术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即向西方认同的关系。在此关系中,作为西方现代文明之一部分的西方现代艺术是被这个世界所认可的惟一合法的现代典范和尺度。换句话说,20 世纪艺术的现代性是以西方现代艺术为尺度和参照的,因此,对 20 世纪非西方艺术而言,所谓的“世界性要求”不外是西方现代艺术所确立的艺术观念、态度和话语方式。只要这个以西方现代文明为中心的世界不瓦解,东西方艺术之间的这种摹仿与被摹仿、

摹本与原本的关系就不可移易。^①艺术参与到世界的对话中,意味着艺术从孤立封闭中走出来,服从于自身区域之外的统一的世界性要求。这固然使民族文艺获得了发展的机遇,但也可能使它丧失原有的一些东西。正像20世纪的中国,传统知识谱系,在“现代化”、“世界化”的大潮中,也就面临着日益“西化”的趋势。这是知识由“中”而“西”的整体性移植。而中国的“文”与“艺”本来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内涵,受西方文艺体系的影响,中国传统的“文”与“艺”,也就逐渐被西方意义上的“文学”与“艺术”所取代,而中国文论也开始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二、西方知识构型

这里的“传统”是中国所固有的,“现代”则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中国传统文论,常有浓厚的体验感悟及诗性表达的特色,西方则偏重逻辑分析与理性表达。人们习惯于把这两种知识形态称之为“感悟型知识形态”和“理念型知识形态”。就是说,中国传统知识更具诗的色彩,西方传统知识更接近于科学。正像亚里士多德,他以“求知”、“观察”、“追问”、“推论”为支点,确立了西方知识话语的科学理性解读模式及以逻辑分析方法为主导的意义生成方式。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开篇即强调,“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是热爱智慧之表现。而这里的求知,既包括向前人学习,更重视发现、创造,对原因和原理的寻求。这种求知,以探求事物的规律,发现其原因与原理为目的,不以实用为目的,它所代表的科学性解读方式,正是西方科学理性学术话语的起点,它与中国式的尊经征圣、墨守家法不同,构成了中西知识话语分道扬镳

^① 余虹:《艺术与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的开始；其二，即观察。人们首先是通过感觉（尤其是视觉）观察，产生经验，在经验知识的基础上通过观察总结，产生技术知识。经验为个别知识，技术为普遍知识，在此基础上，最终产生了纯理论智慧——追究万物原理的哲学。这种认知方式，原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这种旁观者的身份，使得西方哲人将物与我、客观与主观分离开来，以主观的我，思考着客观对象，担当起一个“观察家”的角色，从而确立了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主体与客体相区分的基本哲学思维模式；其三，追问，这是关于原因的寻求。亚里士多德将一切事物的原因归因于“四因”：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这种由追问而产生的因果决定论，构成了西方科学理性话语的重要支柱；其四，推理。亚里士多德通过对范畴、命题、三段论、证明、逻辑谬误、矛盾律、排中律等问题的论述，确立了以演绎法为核心的形式逻辑体系。一切知识的产生，都被置于严密的逻辑推理基础之上，这构成了西方知识的一种普遍的意义生成方式。^①

亚里士多德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西方知识的建构与分类体系。他将人类活动分为三种类型：研究活动、行为活动和生产活动。生产活动又分技艺性生产与非技艺性生产。非技艺性生产是指凭习惯、本能和经验而进行的生产，技艺性生产则是人凭借理性知识、按人所理解的普遍规律而进行的生产。艺术活动属于技艺性生产活动。技艺分两种：补充自然的技艺与摹仿自然的技艺。艺术便属于一种摹仿自然的技艺。艺术的本质就是“摹仿”。摹仿的快感就是求知的快感，摹仿起因于求知。而史诗、悲剧、酒神颂、双管箫乐、竖琴乐等的差异，就在于其摹仿的媒介不同、对象不同、方式不同。摹仿的目的在求真。亚里士多

^① 参见曹顺庆著：《中外文论比较史（上古时期）》，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86~608页。

德也由此确立了西方文论的话语模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建立在科学理性和逻辑分析基础之上的“理念型知识形态”。正如黑格尔所说:“对于理念加以科学的系统的阐述,是直到亚里士多德才发展起来的”。“亚里士多德的不朽的功绩,在于他认识了抽象的理智的活动——认识并且规定了我们思维所采取的这些形式。”^①

亚里士多德也初步确立了西方艺术的分类体系。他将诗、悲剧、音乐等各类艺术称作摹仿自然的技艺。盖伦则把艺术分为平民艺术(*artes vulgares*)和“自由艺术”(*artes liberals*)。“平民艺术”也就是“奴隶艺术”,需要体力劳动,是“手艺的”(*handicrafts*),自由艺术则是“智力的”(*intellectual*)。自由艺术演变成后来的自由七艺:语法学、修辞学、逻辑、算术、几何学、天文学、音乐。

在古希腊,诗人如同先知,具有崇高的地位,像雕塑之类需要体力的造型艺术,地位则不高。罗马时代仍承袭了这一传统。西塞罗仍然把视觉艺术和诗对立起来。他把需要体力劳动的艺术称之为“脏”(*sordidae*)的艺术。雕塑、绘画和建筑就是这种艺术。普洛丁也把艺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使用工具使自然物成为对人类有用的东西,另一类则接近“高度精神世界”。具体包括五种:1. 作为物质对象的产品,如建筑;2. 改善自然的艺术,如医术和农业;3. 模仿的艺术,如音乐;4. 有助于改善人类活动的艺术,如雄辩术和政治学;5. 纯智力的艺术,如几何学。

前两种艺术都不涉及精神世界,后三种则与精神世界发生联系。以精神世界作为划分不同艺术的标准,已经预示了艺术的逐渐精神化的进程。文艺复兴时代,是西方艺术史上一个非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67、269页。